

西方矿业公司与英属撒哈拉以南 非洲殖民统治的瓦解

杭 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西方矿业公司在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殖民统治瓦解过程中发挥了各自影响力。从西方矿业公司对英属中非联邦所产生的作用显示,尽管各家公司影响当地政府、英美政府和非洲民族领导人的措施、步伐不一致,但能够共同维护集体利益,有效施加影响。矿业公司要实现的目标和历史结果之间存在差异,联系列宁帝国主义论,可以揭示出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西方矿业公司;非殖民化;新殖民主义;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

中图分类号:K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1-0036-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1.007

Western Mining Companies and Colonial Collapse in British Sub-Saharan Africa

HANG Cong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Western mining compan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lonial system of British Sub-Saharan Africa and played their respective part in the collapse of the colonial rule. The roles played by western mining companies in British central Africa Federation showed that although the measures and steps taken by the companies to influence local governments, British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and African national leaders were not consistent, they could jointly safeguard their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effectively exert their influence. Together with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panies' intentions and historical results coul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western mining companies; decolonization; Neocolonialism; British 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丰富的矿业资源吸引了众多西方矿业公司。二战后,英国政府曾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蕴藏的矿产是英帝国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仅仅不到二十年时间,英

属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矿业产区就已经脱离殖民统治。这形成了一种悖论。关于西方公司在殖民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凯恩和霍普金斯提出的“绅士资本主义”概

作者简介:杭聪(1981—),男,陕西榆林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非洲史、英帝国史研究。

念主张企业和政府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英国的政治活动同企业意图高度合拍^[1];怀特代表另一个极端,认为商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很少,英国的政治活动同企业意图鲜有合拍^[2];大多数英国学者持中间态度,如斯托克韦尔认为公司与英国政府有联系,但联系并不紧密,所造成的新殖民主义”结果不是商业公司和政府暗中操纵的结果^[3]。本文尝试探讨殖民统治末期西方矿业公司是否曾主动谋求在殖民地独立前后保持自身的经济地位、宗主国政府是否积极地加以配合的历史真相。通过梳理这段历史,力图阐明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理解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如何更深入地了解新殖民主义理论,并为清晰认识国际矿业公司对当今非洲国家的影响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矿业公司在殖民体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非洲国家独立时,现代经济仅仅以“孤岛”的状态存在,且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如刚果的加丹加和赞比亚铜矿带等地区就分布着一些矿业开采点。西方企业几乎囊括了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采矿业、进出口贸易业、航运业、现代制造业、银行业等所有行业。但是,在外国投资者看来,除了采矿业和进出口贸易业外,其他行业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大的贸易公司主导了撒哈拉以南特别是西非地区的对外贸易,矿业公司则在中、南部非洲占据主导性地位。

矿业发展可以说是殖民统治下非洲大陆发展的缩影。矿业资源处于西方矿业公司的控制之下,而并非处于当地政府及当地资本家的掌控下。从1870年到1936年,私人投资到非洲的11亿2700万英镑,有5亿8000万英镑投资到矿业领域^{[4]158}。在1935年以前,约66%对非投资集中于南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和比属刚果(今刚果(金))等地区狭小的矿业产地^{[4]213}。在西南非洲和南罗德西亚,私人投资的90%都投向矿业领域。发展到1935

年,这5个地区生产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92%的矿物,其输出的矿产构成了大陆贸易的67%^{[4]165}。属于公共投资的5亿4600万英镑相似地集中于矿业生产地区,主要投资于矿业需要的管理和交通基础设施^{[4]374}。

那些投资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矿业的资本并不严格遵守疆界。官方数据显示,资本持续地跨越各种疆界^[5],例如英国资本广泛投资于葡属和比属殖民地,特别是投资于加丹加的矿业生产。由于矿业生产需要广泛吸引资金,早在1920年代各大矿业集团就向现代跨国公司的资本组织模式发展,如英属北罗得西亚铜矿带中活跃着南非、美国资本。到了195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大矿业集团已经很难说仅仅来源于西方某个国家了,这就使矿业公司和非殖民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要考察这种关系便需要明了矿业公司在殖民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矿业公司维系着撒哈拉以南非洲依附性经济体制。在矿业开发的刺激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建立起外向型的贸易通道。矿业公司和其他类型的西方公司相比,规模更大,要求劳动力较少,需求地方经济供应更少。矿业公司采用高度资本密集化的方式生产,产品几乎完全用于出口,是真真切切的经济“孤岛”,几乎和地方经济没有多大联系。19世纪末矿物就已经代替农产品成为非洲出口到工业世界的主要货物,为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建立起新的贸易路线。新的路线不再服务于主要的人口和经济中心,设计目的是将矿产品和农产品以最快、最便宜的方式运到宗主国,所有铁路、公路、水路都是笔直地通向大海,相邻地域之间毫无道路建设。矿业公司还成为资本输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渠道。矿业公司利用非洲的矿藏发了财,却没有将主要利润投资于非洲地区。按照1960年罗德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总经理罗纳德·普兰(Ronald Prain)的报告,从1931—1959年间,该集团的毛利润总共有23400万英镑,其中8900万英镑用于付税,7000万英镑作为折旧费和其他杂费,7500万英镑被支付给持股

者^[6]。由于北罗得西亚政府不能自己决定本地区的所得税率,所以从 1954—1964 年间,矿产区流失的矿业股息和矿业特许费总共大约有 2 亿 5 900 万英镑^[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15 年间,是矿业公司在非洲大陆如日中天的时期。如果民族主义政府控制了非洲矿业资源,它们可能会以更符合当地人需要的布局发展矿业,再利用一些资金发展生产、教育、管理、工业的基础设施。而且,可能通过议价获取外国的技术和资本,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殖民政权仅仅提供基本的交通设施、承担管理花费,很少有资金被投入到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发展之中。赞比亚在 1963 年独立时的教育设施就如黄金海岸(今加纳)在 1943 年时那样不充分。这一特征无疑促发了非洲人要求政治权利和对矿业实行国有化的诉求。

第二,矿业公司促进了种族主义政治的生成。矿业开采招引来大量白人移民,成为种族主义政治的基础。在南部非洲更是如此,白人移民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度政治权利,公司缴纳的税款帮助白人建立农场作为工业经济的基础。在南罗得西亚,当矿物出产未能产生预计收益的时候,英属南非公司鼓励从英格兰和欧洲来的移民开发罗得西亚的农业,以图增加公司土地和铁路投资的价值。英属南非公司帮助创造出一个白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由农场主和中小矿主或工作在中小矿中的从业人员构成,成为白人少数统治的主要基础。这一特征无疑激化了当地的种族矛盾,进而引发反殖的政治运动。

第三,矿业公司赖以存在的土著劳动力供应制度,不仅致使非洲传统社会衰退,而且使深受剥削的矿工成为反殖运动的先锋。矿业公司和殖民权威抽调农村青壮年充当廉价非技术性劳动力,导致乡村地区的再生产受挫。为迫使非洲人奔赴矿山,禁止他们在最适宜耕种的地方购买土地,将之拥挤在狭小而贫瘠的土地上。任何改进非洲人农业生产力的努力都受到阻挠,因为那将推高矿场劳动力价格,而且多产的非洲人的农场将使非洲人不再需要外出挣取现

金以缴纳赋税。由于没有出现工业化和农业革新,又由于白人把持着矿业技术性工作岗位,当宗主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非洲劳动力则不得不返回乡村,受到削弱的乡村很难支撑这些劳动力的需要,于是引发社会和道德的危机。经过非资本化的整合方式,非洲劳动力和矿业资源进入到宗主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造成结构性的生产浪费,加重了土著居民的悲惨命运。矿工们所扮演的角色,使得他们的活动更易于点燃全民反殖的烽火。在 1949 年尼日利亚埃努古(Enugu)煤矿罢工运动中,有 21 名工人被杀死,51 名受伤,使得埃努古成为战后整个尼日利亚大众反殖活动的先锋,成为尼日利亚跨种族反殖、反英、反资本家剥削的象征^[8]。1956 年非洲矿工工会组织了遍及铜矿带的持续罢工,引发了英属中非联邦地区全体非洲人对殖民统治新的集体反抗。

第四,同其他行业相比,非殖民化时期的矿业公司有更多发挥影响力主观愿望。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所受压力大,另一方面在于力量集中。因为大商业公司唯一受到的威胁是外贸国际化,但受既有经济结构的影响,问题不大。银行的投资分散于各企业,且往往作为宗主国银行的分支,所受影响不大。现代制造业部门主要为非洲消费者生产,它们的主张仅仅是建立跨种族的财产捍卫联盟。所受压力之大唯一堪与矿业公司相比的是农业部门。欧洲人农业部门存在的基础是殖民时期攫取的土地,其发展极其依赖于税收结构、政府服务和受保障的市场,主要包含三种类型,即移民农业、大土地所有者农业(主要在肯尼亚)、种植园农业(主要在坦噶尼喀和尼亚萨兰)。其中种植园农业直接服务于世界市场,由外国所有者雇佣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同伦敦联系紧密。由于力量相对分散,在英属中东非殖民地的农业部门各分支往往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伤害,其抵制非殖民化进程的能力并不能与矿业部门相比。

综上所述,矿业公司是殖民经济体制的有力支柱,其高额利润是在殖民政权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毫无疑问公司对政治体制的变迁具

有高度的敏感性，非殖民化的风向必然能触发矿业公司的政治行为，至于这种行为的力度、实施的途径、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以及最终取得的结果则需要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加以详细分析。

二、矿业公司对英属中非地区的政治干预

矿业公司在英属中非地区（包括今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的重要性前文已做叙述，但是矿业公司对此地区的政治干预也不容忽略。下面重点以两大矿业集团为例进行说明。

当时在英属中非地区存在两大矿业集团：一是英属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及其控制的英美公司集团（the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Group），二是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the Rhodesian Selection Trust Group）。英属南非公司并不直接从事生产，只是坐享特许费。这个公司由著名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组建，由英国政府在1889年授权管理中非地区的矿业，1933年后仅余北罗得西亚矿藏所有权。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的日常经营由英籍人士罗纳德·普兰爵士负责，他出身于矿业经理人世家，同多届殖民大臣和英联邦事务大臣关系密切。该集团重大决策受到母公司美国金属公司（the American Metal Company Limited of New York）总裁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的干预。

第一，矿业公司操纵着英属中非地区的经济和舆论权力。如一名北罗得西亚殖民官员所述的那样，由于管理人员缺乏，“这里从未出现必要的经验丰富的得力官员处理发展问题。所以矿业管理层已经被迫承担起不属于他们管理范围之内的责任和义务……矿业集团易于从这样的权力结构中获得回报，（但）有时从外面独立观察（公司）代行建立各种政府功能的作法受到一定的欢迎”^[9]。两家矿业集团还共同经营一家媒体公司，其拥有和运转一系列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报纸和尼萨兰仅有的正规报纸^[10]。

第二，矿业公司直接资助当地白人政党，同白人政治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矿业公司资助鼓吹中非联邦的白人政党——联邦团结党（United Federal Party），以保证联邦政治体制的运行。英属南非公司每年资助60 000英镑，旗下的英美公司集团每年直接资助5 000英镑，还和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一起支付联邦团结党务人员多年的薪水^[11]。英属南非公司和当地政要保持密切关系。时任中非联邦首席部长的韦伦斯基感恩地允诺：“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友善地和英属南非公司一起工作，因为他们的利益现在是我们的利益。”^[12]但是联邦团结党不得不仰赖白人移民的选票。许多白人移民都对矿业公司的高额利润怀恨在心，记恨矿业公司抢走了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怀有矿藏国有化或者提高铜矿税率的想法。由于白人移民和联邦主要政党的紧密关系，导致矿业公司未能如在黄金海岸那样取得立法机关的独立代表席位。正是由于公司和白人移民有一定的矛盾，矿业公司不希望中非联邦成为自治领，那样会危及自己投资的安全性，公司更信任英国政府。公司对英国政府的信任建立于自己同英国政界高层的联系之上，这多少影响到了英国政府拒绝中非联邦成为自治领的政策。

第三，矿业集团资助组建起了一个强大的威斯敏斯特游说集团。当1960年英国政府任命蒙克顿委员会（Monckton Commission）到中非联邦调查情况时，矿业集团资助联邦政府聘请英国广告公司为其公关，该公司曾协助组织1959年英国保守党大选，同时资助40多名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访问联邦。这些举措成功地使一些工党下议员不赞同工党在英国议会提出的对联邦的批评性动议。这个游说集团的核心成员多在中非联邦地区拥有商业利益，在英国上下两院中拥有25名核心成员，中心人物是索尔兹伯里勋爵，他是保守党的头面人物，直到1961年都是英属南非公司董事^[13]。这个团体不仅是受金钱感召集合在一起的，而且它代表了一种帝国情怀，它关注“英国政府和海外人群之间的关系”^[14]，反对“遗弃我们帝国的前哨”

和“收缩英国影响范围”^[15]。对于如索尔兹伯里勋爵这样坚守传统观念的托利党人来说,殖民撤退意味着“我们在大声喝彩声中退出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最后摧毁了联合王国国旗”^[15]。罗得西亚的游说者因而能够依赖于这一传统,动员英国政府维持在英属中非地区的殖民统治。

第四,面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矿业公司开始寻求同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采取诸如从管理层到员工层的非洲化、向非洲人提供专项赠款和贷款、建立直接的交流管道和利用国际援助利诱等手段。两大集团面对相同的政治压力并未采取相同的行动,相比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而言,英属南非公司持较为保守的态度。这家公司的股份由英国人、南非人和美国人持有,受美国资本影响不大,相较而言同英国在殖民地的特权联系更为紧密,所享有的经济特权最多,又顾及同南非政权的关系,故所持立场较为保守。不同的是,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美国背景使其可以有更大的余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政治环境。到了1959年8月,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任命了一名非洲人董事,准备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而非传统酋长结成联盟,而且招收更多的非洲工人以淡化自己用工的种族主义色彩。在1960年4月15日,霍克希尔德借助美国非洲协会(the African American Institute)的渠道同班达和卡翁达会面。在1961年5月,美国金属公司而非美国国务院安排了卡翁达同肯尼迪总统的会面以及同世界银行的会面,转化了世界银行对将要成立的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多数政府的融资态度^[16]。通过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母公司在国务院享有的官方渠道,就不难理解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实行的策略同帝国或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差异,也就能清楚了它为何能够比英属南非公司更早地趋近民族主义者。可以说,由于各自的资本来源、开展其他业务的地域不同,以及所享特权、管理结构、管理层的个性和思想意识的不同,两大集团在政治领域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有所不同,两大集团在赞比亚独立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矿业公司立场的区别仅有相对意义。面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外国公司的共同压力,非洲各矿业公司态度趋于一致。特别是1961年,加纳政府提出对英国公司拥有的金矿实行国有化政策后,在非洲的西方矿业公司普遍担心新独立国家会收回采矿权,北罗得西亚的各家矿业公司同样也担心新政府会对矿业公司实行国有化政策。

矿业公司对政治的干预也非肆无忌惮。它们有时应用半官方的商业协会的渠道替自己发表意见,如英国的中东非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Board)。这是由于公司不敢单独发表意见,害怕受到独立后的非洲政府的“迫害”,当英国麦克米伦政府准备接受肯雅塔和卡翁达作为独立后的非洲政府领导人时,中东非联合委员会便发挥了劝阻作用。

在经济上,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大集团加大了从铜矿带向外转移资本的力度。这股资金流便利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矿业开采^[17]。自1957年,美国金属公司先是将业务扩张到美国本土的钼矿、煤矿、钾矿、硝酸钾矿和铝矿,后又开采澳大利亚的铁矿^[18]。在1961年,罗得西亚信托将一些从非洲得来的资金投放到智利铜业,以减少自己对于北罗得西亚铜矿带的依赖。在50年代后期,英属南非公司投资了550万英镑到澳大利亚铝矿^[6]。

英属南非公司捍卫自己的矿业特许权直至北罗得西亚独立前几小时才结束,最终商定赞比亚政府用400万英镑赎买。为了不让北罗得西亚独立后出现普遍的反欧洲裔情绪、为了捍卫在该区域内的其他外国投资,英国政府支付给公司200万英镑。由英国政府支付部分补偿款也是普兰爵士对英国政府的积极建言之一。赞比亚政府将动用在伦敦的200万英镑结余支付补偿,且不再提出修改独立宪法中保护矿业公司权利的条款^[19]。英国政府履行了自己保护公司的“职责”。

三、结语

从所采取的措施上来看,英属中非主要矿业公司采取的措施和西非主要商业公司极为类

似,诸如培植同当地政治力量和政治领导人的关系、实行公司内部非洲化、对当地经济要求让步、寻求宗主国援助和宪法条款限制等手段确保独立后继续维持自己的特权,或者对自己的特权实行赎买。毕竟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矿业公司都依赖于殖民经济体系,共同享受殖民政治体系的支持^[20]。

在殖民地,政府从未按照斯密最小政府的原则行动,政治决策和经济需求紧密相连。殖民地公司对殖民地政府的依赖不仅在于创造市场,更重要的在于在一个敌视的环境中获取利润,具体的政策帮助包括税则、税率、补助金、生产资料供给和其他所需条件。资本在非洲的跨界活动,不意味着资本不和特定的政府结合。无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之后,英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多的投资集中于矿业和石油领域,再加上英国政府为保证矿业公司权利的种种努力,很难说撒哈拉以南非洲矿业丧失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非殖民化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产物的观点有倒因为果之嫌,殖民撤退促成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到来。对帝国荣耀的渴望,不能抵消英国国力衰微带来的影响。面对非殖民化潮流,英国只能寄希望于创造一个温和或弱的继任政府,这成为所有政治安排的出发点。这种安排加上宪法条款和援助协议、再加上矿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性,矿业公司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自己的地位。另外,不管是英国政府、殖民地政府还是新生的非洲人政府都要平衡多种利益,才能获得一定的自主性,矿业公司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

矿业公司权势如日中天的英属中非地区,并没有引发类似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原因有二。一是英属中非地区投资的主体是私人资本,阿尔及利亚油气资源开发的主体是法国政府资金。在英属中非事务上,英国政府在私人资本的压力下行动;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上,法国政府直接发力捍卫自己的投资,而且法国私人资本只顾追随国家资本,降低了自己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法国政府无法冒失去同阿

尔及利亚经济联系的风险。战后新发现的天然气和石油储存,成为该地独立最后谈判中最大的障碍之一。二是英国政府吸取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教训。如英国殖民大臣麦克劳德后来所述的:“我们无法用武力保住我们在非洲的属地。甚至在动用大批部队的情况下,我们连塞浦路斯这个小岛都保不住。戴高乐将军都无法制服阿尔及利亚……”^[21]

主要凭借间接的金融控制,英国政府和矿业公司延缓了民族主义者改变经济体制的努力。这种方式是列宁揭示过的两种帝国主义殖民方式之一,此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使直接的殖民统治变得不再可行。在赞比亚,政府以渐进而温和的方式实现了铜矿业的国有化。1964年,赞比亚政府大幅度提高矿业公司所得税和铜矿出口税。1969年,赞比亚政府获得了铜矿业51%的股份。1974—1975年,赞比亚政府开始全面管理铜矿物的买卖。到1981年,赞比亚政府整合全部铜矿业成立国有赞比亚联合铜矿有限公司。由于种种原因,赞比亚联合铜矿有限公司遇到了许多问题,导致铜产量的滑坡和税收收入的减少。政府不得不在1989年做出决定,将铜矿经营恢复到以前的私营模式,以此来振兴经济。在私营化进程中,284家公司中的260家通过赞比亚私有化委员会售卖出去,到2000年3月全部完成了对矿山企业的私有化。私有化后,英国对赞比亚的投资再次集中于铜矿业,在赞比亚的铜矿生产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曾经在北罗得西亚土地上活跃的英美公司的英美金矿公司和兰德金矿公司又一次进入了赞比亚。

这种间接金融控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矿业公司通过金融手段建立起来的庞大的跨国集团,此类集团不仅在业务范围而且从资本来源上都呈现出多国的形态。但这种多国性特征并不能抹杀母国国家资本同公司私人资本的联合,这一点从矿业权利博弈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反映出来。由于历史原因,非洲民族主义者还在资本和技术上有求于西方跨国公司,这就导致了现实中非洲民族主义者和跨国公司之间存

在着既对立又协作的关系,而关系的核心是对矿业资源收益权的争夺。如恩克鲁玛在其名著《新殖民主义》一书中所呼吁的那样,需要非洲人政府联合起来以制衡这些矿业公司的影响,力争取得经济独立。但是他忽视了列宁理论中阶级的维度,毕竟非洲的发展不仅仅受困于西方的金融控制。

参考文献:

- [1] CAIN P, HOPINS A.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M]. 3nd edn. London: Routledge,2016:665.
- [2] WHITE N J. The busi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0,53(3):544—564.
- [3] STOCKWELL S. Trade, empire, and the fiscal context of imperial business during decolonization[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4,57(1):142—160.
- [4] FRANKEL S H. 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 [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
- [5] LATHAM A J H. The depressio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M]. London: Routledge,1981:71.
- [6] ROBERTS A D. Notes towards a financial history of copper mining in Northern Rhodesia [J].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1982,16(2):347—359.
- [7] ROBERTS A. A history of Zambia[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214.
- [8] FALOLA T. Colonialism and violence in Nigeria[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9:165—169.
- [9] GREGORY T. Ernest Oppenheime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fric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395—396.
- [10] FABER M L O, POTTER J G. Towards economic independ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22.
- [11] KEATLEY P. The politics of partnership[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1963:465.
- [12] SLINN P. Commercial concession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in Northern Rhodesia 1890—1964[J]. African Affairs,1971,70(281):379.
- [13] LANNING G, MUELLER M. Africa undermined: mining companies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Africa[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1979:183—184.
- [14] HOROWITZ D. Attitudes of British conservatives towards decolonisation in Africa[J]. African Affairs,1970(69):26.
- [15] SALISBURY L. Decline and fall [N]. The Sunday Times,1964-01-26.
- [16] COHEN A. Business and decolonisation in Central Africa reconsidered[J].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2008, 36 (4):649—651.
- [17] CUNNINGHAM S. The copper industry in Zambia [M]. New York: Praeger, 1981:195—196.
- [18] NAVIN T R. Copper mining and management[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8:279—280.
- [19] MURPHY P.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Central Africa[M]. London: HMSO,2005:132.
- [20] LAWAL O A. British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process in Nigeria, 1950—60 [J].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1994(22):93—110.
- [21] GOLDSWORTHY D. Colonial issues in British politics,1945—1961: from ‘Colonial Development’ to ‘Wind of Change’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363.

(责任编辑:李秀荣)